

大平正芳与日中邦交正常化

许晓光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坛著名政治家,他在担任日本自民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职务期间,对日中关系曾发表过自己的认识和主张。根据这些认识,他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大平正芳;日中关系;日中邦交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5-0125-08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和中日两国商定的“中日友好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之年,我们不能不怀念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卓越贡献的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自民党和日本内阁中先后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直至担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就日中两国关系问题曾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并为进一步增进日中两国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位重要政治人物却几乎未进行过研究。本文试图论述和评价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问题的认识,以及他在两国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要评价大平正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必须首先考察他对日中关系的认识,以及产生这些认识的背景——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历程。

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的认识与外交实践的前期阶段可追溯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首次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时。这一阶段,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的认识是十分局限和比较矛盾的。他第一次对中国有直观的认识,是日本侵略中国的1939年6月。那时,大平正芳还是一名年轻的大藏省(财政部)官员,被派遣到中国张家口的兴亚院联络部担任经济科长。在蒙疆地区开展经济调查期间,大平正芳对中国只有表面的感性认识。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在内蒙地区作威作福,“在当地行政上拥有绝对实权的还是军司令部,校尉官级的青年参谋在那里任意行使权力”[1](30—31页)。他对这些军人干下的令人发指的勾当感到深深的厌恶。尽管如此,对于日中两国关系,年轻的大平正芳并没有认识到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内蒙工作以及后来回到兴亚院任职,同许多日本同胞一样,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在自己一生的履历中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之前的27年间,日中两国关系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

收稿日期:2002-04-02

作者简介:许晓光(1955—),男,四川省成都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急于把日本变成“反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向日本大量订购军事“特需订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年10月,由于特需订货达到14900万美元,日本国内生产突破了战前的水平[2](776页)。对此,以吉田茂为首相的日本政府当然是感恩戴德的。加上美国的高压政策,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往往追随美国,几乎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这种状况在各战胜国对日本媾和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和苏联历来主张对日本进行全面媾和,让受到日本侵略危害的世界各国都参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并从日本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1950年10月26日,美国却提出了所谓“对日媾和七原则”[3](61—62页),企图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排斥中国,孤立苏联。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4](67—68页)。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茂政府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和会上与“愿意媾和”的国家签订了媾和条约。受日本侵略危害最深的中国则被排除在和会之外,而且需要将来由日本选择与中国还是台湾缔结媾和条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开了一个滑稽的先例,连日本国内人士都认为,“在缔结媾和条约时却要由战败国日本对战胜国的中国政府进行选择,这种决定恐怕是史无前例的”[2](785页)。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于“九一八事变”20周年之际再次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对日片面媾和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1233页)。

此时,大平正芳正担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秘书官。作为一名尚未进入政界的普通事务官员,他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外交内幕。当旧金山和会召开时,大平正芳与两名日本议员一起正在美国考察科技政策。当他从美国报纸上读到和会的消息时,他只是想到“日本恢复独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心情特别激动”[1](56页)。

美国表面上是让日本自由选择与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媾和,实际上对日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杜勒斯甚至表示,如果日本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媾

和对象,进行谈判,美国参议院就不会批准两国签订的条约[6](358页)。吉田政府最后选择台湾作为媾和对象。这一外交决策为以后日本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定下了一个基调,即与台湾保持所谓“友好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疏远甚至敌视的态度。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开毗邻的中国大陆市场,日本企业界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与渴望和平的日本普通百姓一起,掀起了促进日中友好的运动,并于1952年6月,在北京与中国缔结了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自1954年8月起,日本民间更掀起了日中贸易运动和恢复日中邦交运动。

然而,与此相反,由于吉田政府定下的外交基调和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主导,以后的两届日本政府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上均无实质性举措。鸠山内阁对中国三次提出的邦交正常化的呼吁均未作任何积极响应。岸信介任首相时,日本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达到相当恶化的程度。岸信介任首相后,反复申明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两国正常邦交,并到东南亚各国散布“中共威胁论”,又首次以战后日本首相身份到台湾,煽动蒋介石反攻大陆[7](92页)。岸信介政府这种态度导致两次“国旗事件”^①的发生,使日中贸易关系全面中断。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1960年7月—1964年11月),日中关系有所缓和。池田采取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强调要推进日中贸易,通过自民党内的亲中国派沟通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渠道,还批准了对中国出口价值74亿日元的维尼纶成套设备,使日中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贸易三原则”^②却持回避态度,认为“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两者截然分开来同中国进行往来,并没有任何不妥”[8](176页)。因此,在外交上仍然追随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为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出力。

佐藤荣作内阁时期(1964年11月—1972年7月),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比起池田内阁时期大为后退,回到了敌视中国的状态。佐藤政府禁止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向中国出口成套生产设备,导致这些在池田内阁时期已获批准的出口合同作废。中国方面强烈谴责佐藤政府的这些行为,是“敌视中国政策的又一个严重表现”[9]。佐藤政府还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果遭

到失败。1971年,在未同日本磋商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华,这使佐藤政府在外交上陷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尽管1972年3月佐藤在国会上承认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政治三原则,但为时已晚。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对佐藤已不抱希望”[2](904—905页)。改善日中关系只有靠下一届日本政府了。

在日中关系艰难曲折、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大平正芳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事务官员,逐渐成长为日本政坛的一名重要政治家。1962—1964年,他担任池田内阁外务大臣。应该看到,作为一名部长级的政治家,大平正芳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池田政府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友好关系”、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与中国进行交往这一基本对华政策的。在这种基本政策框架内,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问题的认识当然受到时代局限。不过,作为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中日关系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大平正芳认为日中两国关系非同一般。他担任外相后,有一次对同他一起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通商产业大臣福田一表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象大年三十与初一的关系一样密切,“虽说同文同种,但在文化的表现方法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相似点却大大少于不同点。正因如此,才需要耐心与努力,把中国当做必须在和平环境中进行交往的重要邻国”[10](255页)。这表明此时的大平正芳已对日中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

其次,对美国、岸信介政府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战政权”和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构成“严重军事威胁”的舆论,大平正芳持否定态度。1964年2月18日,大平正芳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进行答辩时,谈了他对日中关系问题的看法。大平在答辩中认为:目前,中国对日本并不构成“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威胁”,赞成日中两国互派记者。当时的重要新闻机构——日本新闻社和共同社都对大平的这一讲话作了报道。这些新闻机构评论认为:大平断言中国对日本不构成威胁,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态。

对于日中两国何时恢复正常的邦交这一敏感问题,大平正芳持谨慎态度,认为它必须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相联系。1964年,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回答议员质询时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在世界的祝福中出现中共政府加入联合国那样的事态,我国也必须下决心作重大决断”;“如果出现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受到祝福,理所当然应当考虑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10](255—256页)。1966年4月5日,在自民党本部主办的研修会上,已辞去外相职务的大平正芳发表了讲演,着重谈到中国问题,这可以说是60年代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认识的系统阐述,其中涉及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大平正芳首先表示已充分注意到在野党的强烈呼吁,即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但是,他认为,由于中国现存北京和台北两个政权,而且双方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因此日本只能被迫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我们的先辈毕竟选择了台湾。选择台湾以后便无法再承认北京。承认北京就必须舍弃台湾,目前日本要下那样的决心到底是办不到的”[11](182—183页)。但是,他又认为,如果“国际舆论承认北京的中国代表权,我国的联合国政策和我国政策都将迎来一个大的转机,我想国内舆论也的确会日益活跃起来”[11](184页)。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大平正芳仍不能突破吉田时代外交政策的局限,但他已在考虑,如果有一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政府应采取何种新的对华政策。

对于池田政府“把经济政治分开与中国进行交往”的对华方针,大平正芳认为,“所谓政经分离原则,乍一看会认为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清楚。所谓把政治经济分离的作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行不通。政治和经济终归是一体的。只不过把大家说的那种政治原则——虽不保持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但民间水平的接触乃至贸易却是可行的——称为政经分离的原则罢了”[11](183页)。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大平正芳的这种认识,已与中国方面的立场非常接近。中国提出“贸易三原则”后,又灵活地提出,原则上双方的民间贸易协定应由两国政府协定加以保障,但若没有政府间协定,如果条件成熟,中、日企业间也可个别缔结民间合同[7](115页)。

对于同中国的贸易,大平正芳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与“以中共为首的所谓共产圈的贸易”,归根到底也就是互通有无,与日本同其他“自由圈”的贸易没什么两样,政府不应对此有何特

别举措,对与“共产圈”的贸易既不特别限制,也不特别奖励。所以,指责政府在对中共贸易时实行贸易政策上的差别待遇,是不准确的[11](184—185页)。

基于这些认识,为密切日中关系,促进日中两国间的贸易,以便为将来恢复日中邦交创造条件,大平正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秘密支持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松村谦三为打开日中两国关系的大门到中国开展活动[12](320页)。松村谦三到中国后,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确定了扩大日中两国贸易的基本宗旨。遵照这一基本宗旨,1962年10月,日本实业家、前通商产业大臣高崎达之助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后来的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会谈,双方以“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为基础,交换了“日中民间贸易综合备忘录”,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被称为“LT贸易”(LT是廖、高的日语假名首位读音)。1963—1967年平均每年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13],此后日中贸易大幅度增长。

对于日本与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美国和台湾当局深感不安。美国经常宣扬“中国威胁论”,极力主张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更反对日中之间贸易的扩大。大平正芳为此向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斯克做了不少解释,反复强调恢复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并说明“日本政府对同中共贸易,既不特别鼓励,也不特别反对”。在他的耐心解释下,美国对日中贸易的态度终于有了转变,由以前坚决反对变成了“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但表示了理解”[10](253页)。然而,台湾当局和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却激烈反对日中之间贸易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1963年夏天日本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时可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时,这种反对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来之不易的日中贸易发展大好前景不致中途夭折,大平正芳又耗费大量精力对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反复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当今世界贸易的主导形态,正由早期的分散买卖物品转变为出售成套设备等完整形态。支付也多用现金决算,而使用延期付款方式。既然进行贸易,就不能背离时代的要求。如果日本不同中共进行与西欧各国同一水平的贸易,难以说服日本国民。希望对这点能够给予谅解。”[12](231页)在另外的场合,大平正芳也表示:“所谓向中共出口设备是否

使用出口贷款的问题,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应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1](185页)

考察这一阶段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的认识和外交实践,可以看出其矛盾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大平正芳有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无法突破吉田政府定下的外交政策的束缚。比起战后的几届日本政府来,在对华关系上,他顺应历史潮流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比起他以后为恢复日中邦交所作的努力来,又显得较为保守。

二

田中角荣于1972年7月组建新内阁后,任用自己的竞选盟友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在重新担任外务大臣前后,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的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在外交实践上也有了突破性的举动。

1971年9月1日,大平正芳在宏池会^①议员研修会上,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就和平外交阐述了他认为很重要的日中关系问题,并批评了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去年秋季以来,联合国的大势已迅速朝着承认北京有权代表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其后,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国的舆论也大幅度地朝这个方向摆动。我认为,政府正确评价这种形势,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我相信,政府遵循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同北京进行政府间接触,才是顺应国内外舆论之道。即使在尚未最终解决之前,也希望政府慎重,不要做诸如在联合国支持逆重要事项提案^②之类的倒行逆施之事。”[14](210页)可以看出,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大平正芳对日中关系的认识比以前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由以前主张与中国保持民间经济、文化友好交流的关系,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再考虑与中国恢复邦交,转变为敦促政府尽快同中国进行政府间接触。

这种认识更进一步的具体表达,是在1972年5月8日大平正芳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大平在建议里强调:“亚洲地区局势不稳定,‘日、中两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为了完成对亚洲和平负有责任的日中两国的永久和解,我们必须迅速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但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私心和幻想,虽说还有困难,

但我想终究是不容回避之事。而且这项事务早就经过了民间协调时期,现在已到了由政府承担责任负责处理的阶段。我再次迫切期待政府应该倾注诚意,抓住这个问题,致力于邦交的恢复”[15](215、219页)。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进行密切交往,促进日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是日本民间人士和在野党成员,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交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大平正芳作为一名即将出马竞选执政党总裁和政府总理的政治家,能够站在维护亚洲和平的高度,极力主张通过政府间的直接交往,迅速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除了当时的竞选因素外,这些主张也表现出大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基于这种认识,大平正芳担任外务大臣后,更加明确了立即恢复日中邦交的外交方针。新内阁刚成立不久的7月1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关于被称为最大课题的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大平明确表示:“如果不进行政府间接触,那将一事无成。”当记者问到日中两国是否应该以对等地位来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大平回答道:“外交,当然应该是对等的。不过问题在于,在战争中(日本)处于加害者的地位。不根据这一点来进行是不行的。”记者问:“是不是应避免由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使第三国,即亚洲各国处于窘迫景况?”大平断然回答道:“是那样。但是若把台湾作为第三国的话,那是制造‘两个中国’,那样,是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16]大平正芳在这里就日中关系明确了三点方针。1. 两国邦交正常化必须通过政府间接触才能取得结果,也就是表明这种重大外交悬案现在不能继续通过在野党或民间人士等非正式渠道进行,而应由两国政府通过正式外交谈判来完成。2. 外交谈判必须立足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危害这种基本出发点来进行,而不象以前美国和日本宣扬的那样是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威胁”。3. 日中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但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新一届政府反对搞“两个中国”的作法。可以认为,大平正芳的这种态度,不仅是他本人对日中关系认识的新飞跃,而且是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对日中关系最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最现实的表态。

在这种大政方针指导下,大平正芳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而付出了辛勤努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为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某个阶段,政府首脑将访华。但是,作为政府来说,打算进一步脚踏实地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17]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处事作风:谨慎踏实,不轻易承诺。8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文章评论道:“在田中内阁里,以外相身份担负新政权一翼的大平正芳,在今秋首相、外相访华前夕,正在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而满头大汗地进行奋战……他要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步骤而冥思苦想,试拟方案。”[18]大平也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个重大的外交课题,同时也是个极为困难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一向认为,处理这一问题必须公正,以取得国内外充分的理解。”[1](84页)为此,大平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第一,调整相关机构,并在外务省进行总动员。大平在外务省设置了由外务次官、有关的司局长、科长共15人参加的中国问题对策协议会,专门研究在进行复交谈判时日本在各个问题上的对策。8月2日,在这个协议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大平外相发出指示:“这是关系国家的百年大计的问题,不允许有任何疏忽。而且事情要求很急,希望大家取消夏季休假。”[12](317页)大平外相当然也以身作则,与大家共同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苦战夏日。

第二,探明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为复交谈判作充分准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的信息,大平正芳已经了解到中国政府诚心与日本新一届政府正式接触,商谈邦交正常化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担心,“我国既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中国方面会不会接受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因为过去中国方面对日美安全条约体制一直不断地发表批判性的言论”[1](83—84页)。除此而外,大平正芳还打算努力探明一些重要问题,如以前日本与台湾的“和平条约”怎样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是否继续保持,中国是否会放弃数额庞大的战争赔款要求等。大平正芳就这些问题与中国方面信任的众议员古井喜实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他又积极地与中国方面的代表——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进行正式接触,获取了中国方面希望尽快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信息。但是,他最后获得中国对复交谈判的具体意图,是在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归来后的8月4日。竹入对周恩来提

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中方草案作了详细记录,包括:日美安全条约的存在、佐藤与尼克松商谈的“台湾条款”以及钓鱼岛问题,均不会构成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障碍。考虑到两国的长远友好,中方准备放弃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赔款要求,拟缔结一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来取代以前日本与台湾订立的条约等等。大平正芳得到这份包含八项内容的记录后,才最终探明了中方对自己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态度。他对竹入表示:“剩下的就是首相的决断了。如果定下来,我发誓作为外相,我将排除万难干到底!”接着,他又在几天后敦促田中首相:“中国方面的意图已经搞清……让我们下决心大干一场吧!”[10](373—375页)9月上旬,大平正芳又就两国复交谈判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与中国方面信任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进行了反复讨论。然后,派他们两人于13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进行先期磋商。磋商内容包括战争状态的结束、如何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处理“复交三原则”问题等[12](325—326页)。大平的这种安排进一步探明了中方意图,为复交谈判作了更加充分的准备。

第三,协调内部关系,排除恢复日中邦交的障碍。对于日中邦交正常化,自党内意见分歧很大。由212名众议员、99名参议员和5名前议员组成的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里,既有积极推进邦交正常化的亲华派,也有众多坚持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亲台派,还有主张与海峡两岸都保持关系的“慎重派”。从8月初以来,该协议会内每天都要进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争论,要统一思想非常困难。每当大平外相阐述恢复日中邦交的见解时,都会受到亲台派的激烈攻击。大平正芳对此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又坚持不作让步。在大平的顽强坚持下,协议会于8月9日通过了支持首相访华的决定。24日,协议会正副会长会议通过了《政府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草案)》,这就是9月8日在自民党大会上最后确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五条:1. 必须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2. 相互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3. 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4. 增进相互间平等的经济文化关系,互不歧视;5. 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而合作[10](379页)。

基本方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认识的统一。随着访华日期的临近,大平正芳作为恢复邦交的主要谈判者,受到反对派的压力甚至威胁越来越大,家里不断接到威胁邮件,他自己也感到了生命危险。这种感觉,他曾对《产经新闻》记者阿部穆正和秘书真锅贤二表露过,并写下了有关遗书[12](326—327页)。但是,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大平正芳以一名政治家的魄力,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复交谈判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

第四,探明美国态度,为访华扫清外部障碍。大平正芳虽然在新内阁刚成立时表示,日本跟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独立作出决定。但是,他明白:即使在冲绳归还后,日本实行完全的独立外交也还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种重大的外交课题,必须取得日本最密切的战略伙伴美国的谅解。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与大平在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日方向美方表示,不管成功与否,日本都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美国方面表示“预祝成功”[1](83页)。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日本政府首脑即将访华一事表示肯定,并说“双方希望这有助于促进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

日美谈判后,大平发现中国对于日美联合声明没有作出特别反应,于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对于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旧金山体制不提出异议,多年来成为悬案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就应该借此时机加以解决”[1](84页)。

在经过这些精心准备之后,大平与田中一起前往中国进行复交谈判,最终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值得一提的是,大平正芳在谈判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谈判开始时,重大原则问题由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与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进行谈判,具体细节由大平与姬鹏飞会谈。后来,田中首相把谈判的主要任务全权委托给大平,自己甚至还有时间在国宾馆里吟诗作赋[12](327页)。所以,双方之间许多敏感的关键问题是由大平与周总理、大平与姬外长共同商定的,一直忙到签约的9月29日凌晨4点半,双方才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双方商定日本与台湾关系问题不写入联合声明,但日本方面应口头声明结束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当9月29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大平立即按照与周总理的约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结束日本与台湾的“和平条约”[7](278—

279页)。由此可以认为,大平正芳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功臣。周恩来总理也对大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平诚实无欺,不善言辞,是个内秀而博学的人。他诚心诚意辅佐田中,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有中日复交。”[10](384页)

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意义,大平正芳在许多场合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对亚洲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的划时代的事件。在恢复日中邦交的当年10月28日第70届国会上所作的外交演说中,大平正芳强调:“使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确立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亚洲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事件。”[19](4页)“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秩序和繁荣作出贡献……日中两国只有通过这种稳固信赖的邦交,才能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友好关系并使其得到发展。作为政府,将为此作出不懈努力。”[19](9页)10月6日,在日本政府内外形势调查会讲演时,大平正芳也表示:“更根本的是,两国之间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信赖。我们一定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如果那样做,我坚信

必然会开拓日中关系的未来。”[20](171页)

在大平正芳第二次担任外相,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年间,日本驻华大使馆规模迅速扩大,人数达到了49人,仅次于驻美国使馆而成为日本第二大驻外使馆[22](161页)。由此可见,大平正芳为增进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于1974年初再次访问中国,就国际局势与中国领导人广泛交换了意见,对双方之间的航空、海运、渔业等实务性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为双方签署航空协议奠定了基础。大平正芳在其它外交活动场合,从不发表有损日中关系的言论,也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之类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他生前作为总理最后接待的政府首脑率领的代表团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和“中日友好年”来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大平正芳这位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日本政治家,也希望日本新一代领导人能够以这位前辈为楷模,做两国友好关系的促进者。

注释:

- ①一次是1958年3月,台湾当局对在日本的中国商务代表团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提出了抗议,岸信介政府以尚未恢复邦交为理由,否认中国代表团有悬挂国旗的权利。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愤怒。中国政府于1958年4月废弃了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停止履行450亿日元的进出口合同。另一次是1958年5月2日,在日本长崎市百货大楼内举行中国工艺品展览时,两名日本反华分子撕下了悬挂的中国国旗。中国方面反应非常强烈,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指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岸信介却反诬“中共才是不友好的”。5月10日,中国方面提出了全面停止两国贸易的方针,并中止了两国渔业谈判。(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20页。)
- ②“贸易三原则”是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的,即:1. 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2. 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 不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 ③宏池会是自民党几大派别中池田派的组织。1971年4月17日,大平正芳担任了该会会长,成为自民党一个重要派别的领袖。
- ④所谓“逆重要事项提案”就是指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提出“驱逐台湾也是重要事项,需联合国成员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提案,以便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参考文献:

- [1]大平正芳. 我的履历书[M]. 辛华,雅飞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2]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M].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问题致苏联的备忘录[A].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 [4]周恩来外长关于对日和约的声明[A].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 [5]周恩来. 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对日和约的声明[J]. 新华月报,1951,(10).
- [6]猪木正道.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M]. 江培柱,郑国仕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 [7]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 日中友好运动史[M]. 东京:青年出版社,1975.
- [8]藤昌哉. 池田勇人及其生与死[M]. 东京:至诚堂,1970.
- [9]人民日报评论员. 佐藤政府反动面目的进一步暴露[N]. 人民日报,1965-01-08(5).
- [10]日本大平正芳纪念财团. 大平正芳[M]. 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11]大平正芳. 日本外交的座标[A].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 大平正芳回忆录[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82.
- [12]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 大平正芳传[M]. 武大伟,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 [13]廖承志,高崎达之助签订备忘录[N]. 人民日报,1962-11-10(1).
- [14]大平正芳. 日本新世纪的开幕[A].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 大平正芳回忆录[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82.
- [15]大平正芳. 和平国家的行动原则[A].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 大平正芳回忆录[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82.
- [16]大平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N]. 产经新闻,1972-07-10(1).
- [17]朝日新闻评论员. 大平外相说,将脚踏实地地进行准备工作[N]. 朝日新闻,1972-07-17(1).
- [18]每日新闻评论员. 大平外相“炎热的八月”,为奠定“日中”基础而汗流浹背[N]. 每日新闻,1972-08-01(2).
- [19]大平正芳. 在第七十届国会上的外交演说[A]. 风尘杂俎[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77.
- [20]大平正芳. 完成日中正常化谈判[A]. 风尘杂俎[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77.
- [21]永野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Masayoshi Ohira and Normalization of Japanese-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XU Xi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Masayoshi Ohira, well-known statesman of the Japanese politic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voices his opinions and positions on the Japanese-Chinese relation 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capacities as official of the Japanes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Judging from these opinions and positions, h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course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Japanese-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and makes an ever-la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friendly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Masayoshi Ohira; Japanese-Chinese relation;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